

目 录

- 一场严峻的黄河归故斗争段君毅(1)
- 花园口堵口始末回忆陶述曾(38)
- 我对黄河归故谈判的片断回忆王化云(92)
- 华东大学始末余 修(99)
- 回忆抗日根据地的胶东公学李芸生(122)
- 从八路军山东干部学校到抗大一分
校的回忆片断孔福亭(142)
- 抗战初期的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
部聊城政治干部学校.....许 法 邓愧余(164)
- 从复旦到山东师大章 益(169)
- 和澄之同志共事的岁月陶 钝(175)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伞兵钟汉勋(179)

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的前前后后钟汉勋(208)

吴佩孚的晚年生活王振中(217)

国民党济南空军与宪兵的一

场冲突黄 侗(224)

一场严峻的黄河归故斗争

段 君 毅

一、蒋军决堤花园口 洪水横流豫皖苏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密令，炸毁了黄河花园口河堤，霎时间滚滚洪水象猛兽一般地吞噬着沿岸600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蒋军的这次决堤放水，给沿河人民造成的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对黄泛区灾情的不完全统计为：

一、淹没耕地面积：河南省450,553公顷；安徽省284,598公顷；江苏省109,108公顷，总计是844,259公顷。

二、逃亡人员：河南省逃离1,172,639人，死亡325,589人；安徽省逃离2,536,315人，死亡407,514人；江苏省逃离202,400人，死亡160,200人，总计逃离3,911,354人，死亡893,303人。

三、按动产与不动产计算，所受经济损失，以战前法币折人民币计算：河南省是19,328.5亿元；安徽省是25,265.8亿元；江苏省是3,210.3亿元，总计是47,806.5亿元。

四、按农业减产计算：河南省22,452.7亿元；安徽省18,104.6亿元；江苏省6,916.7亿元，总计减产47,474亿元。至于土地变异，河道淤积，水利设施破坏等项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

以上各项损失，仅财产及农业减收两项的统计，即达95,230.7亿元，与同一年度里全国发行的建设公债相比，超50%以上。

以上各项统计中说明，在日军大举犯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国民党政府密谋的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可是不料，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政府却又要花招，提出要堵塞花园口口门。很明显，其用心是不良的。

二、国方要堵黄河口 震惊两岸百万人

抗战胜利，万众同乐。国民党政府为了独吞胜利果实，一面玩弄和谈烟幕，一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准备打内战。冀鲁豫解放区地处陇海、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干线，背后是广大的晋察冀、太行、太岳解放区，也是刘邓大军所在地，东面与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相互配合；南面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野战军遥相呼应，黄河故道从其中心贯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政府对冀鲁豫解放区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他们要黄河归故、东流入海的企图，不言自明。

中共中央虽然深知黄河归故后会给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但为了照顾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并且考虑到黄水久注淮河，必致淮河淤淀，南泛长江，势将危及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央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同志与

国民党会商，在不使下游发生水灾的条件下，原则上是赞成此举的。关键是要在复堤整险竣工后，才能堵口移河，否则，将会出现第二个更大的黄泛区。

所谓黄河故道，是经过八年战乱的故道。在八年抗战期间，黄河大堤很多堤段被日伪军作为进攻解放区的封锁沟、封锁墙，再加上风雨的侵蚀，损坏程度已达十分之三以上；两岸防险坝埝的砖石，大部被日伪军拆去修碉堡工事，更是破烂不堪；河床高出地面丈余，且淤沙大部变为沙丘，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不等；黄河三角洲淤塞的面积达200余里，在洲上居住着十余万人民，建立了347个村庄，这里的土地大部分被开垦成良田。据统计冀鲁豫解放区沿河自长垣至齐河（缺长垣、考城、寿张三县统计），有813个村庄，307,457口人，426,899间房屋，1,426,249亩土地。其中新建村庄213个，62,070口人，79,691间房屋，396,248亩土地。山东渤海区沿河有347个村庄，105,630口人。因此，在黄河堵口之前，必须精细勘察，妥善修理堤坝与河道，更须对堤内人民予以妥善安置，方不致因黄水骤至而演出天痛人怨之惨剧。

整理黄河故道的工程是十分艰巨的，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同时，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也决无独立完成此项工程的能力。如果不复堤修坝整理险工，不迁移救济河床居民，就堵口放水，不仅故道内的居民村庄要惨遭黄水的浩劫，就连故道两岸的广大居民村庄，也将遭到黄水的灾难。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国民党政府却在解放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堵口放水的部署。

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下同）移驻开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做堵口放水

的筹备工作。

1946年1月11日，美籍水利工程师、黄委会工程顾问塔德等一行四人，突然由开封来菏泽，声言要勘察黄河故道。冀鲁豫行署给予热情接待，并派专人领其至临濮集一带勘察了黄河故道的堤坝和河床。他们仅停留三天，便匆匆返回。不料，返回不久，国民党中央社便造出谣言，说：“由于中共之一再阻挠，迫使勘测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以此为他们不复堤整险制造借口。

1月22日上午九时，河南救济总署署长马杰召开救济灾区座谈会，联合国驻中国办事处主任范海宁（加拿大籍）专程到会致词。在他的致词中，只谈堵口如何重要，却闭口不谈下游复堤。

1月31日，国民党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下同）豫分署，连日视察花园口口门情况，研究堵塞口门方案，计划建立堵口复堤工程局，分设冀鲁豫三个复堤工程处，并对工程款项、器材、工人食宿、卫生等做了详细的研究，大有即刻就叫口门合龙之势。

2月1日，水委会派遣工程师及技工偕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下同）驻该会工作的道特（美籍）前往河南泛区勘察，在泛区同胞中散布堵口言论，制造堵口气氛。

2月4日，国民党黄委会顾问王恢先，黄泛区复兴与建设协会常委易伯坚及社会处代表等在黄泛区举行座谈会。他们只谈对黄泛区居民的救济问题，却不谈对黄河故道居民救济的工作。

2月6日，联总中国业务处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该处

长奥斯德说：“黄河堵复计划最为重要，可使20万农民及其眷属重返昔遭泛滥之地。”企图在全国造成强大的堵口舆论。

2月中旬，在国民党水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简称堵复局，下同），赵守钰兼任局长，李钟鸣、潘镒芬任副局长。

2月16日下午三时，赵守钰在黄委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工程计划问题提出以下困难：一、中央核拨之工程款5亿元，中央银行不能一次提取。二、整修汛区堤防预算需费11亿元，尚未核准，以致无法动工。三、考城以下国、共军阻挠，测量工作无法进行，盼新闻界代向各界呼吁。要求疏通河道，修筑河堤，妥善救济和迁移沿河居民；吸收沿河群众代表与民主政府，组成统一的治河委员会，并筹移河大计。

3月1日，国民党政府不通知冀鲁豫解放区政府，指示堵复局在花园口正式开工堵口。以塔德为首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带着桥梁材料、木船、汽船、推土机、开山机、钢轨、斗车、汽车、修理机械等投入了施工；行总派出工作队、卫生队；河南省政府组织了招工购料委员会；交通部彰洛段工程处赶修通往花园口的铁路专线；平汉铁路局拨出了赶运堵口器材的车皮。一时间，整个花园口堵口工地上，人来车往，机器轰鸣，一派忙乱不堪的景象。根据塔德的建议，国民党最高当局作出决定，花园口堵口工程6月底以前完成口门合龙的任务。

国民党抢先堵口的消息传出后，冀鲁豫解放区沿河各县群众无不震惊万分，纷纷向各级民主政府请愿，反对国民党不复堤就堵口的做法。为此，冀鲁豫行署认为：国民党既要在花园口堵口，位于黄河下游的解放区必须得做好思想上、组织上、人力上、物力上等方面的工作，准备黄河水回归故道。于是冀鲁

豫行署通令沿河各县，要立即调查黄河故道居民新辟耕田、林地，所建新村房屋、户口材料，以及堤坝破坏情形等，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利用黄河归故嫁祸解放区的做法。

2月中旬，中共中央来电指示：“黄河归故，华北、华中利弊各异。但归故意见全国占优势，我们无法反对。此事与我解放区关系极大，我们拟提出参加水利委员会、黄委会、治河工程局，以便了解真相，保护人民利益。”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冀鲁豫行署决定，除在群众中宣布国民党要改河归故的消息外，并就如何使群众的损失得到赔偿，应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什么要求，如何参加治河机构等问题，通知全区各级组织，加以认真研究和对待。

2月22日，冀鲁豫解放区政府为了确保自己对治理黄河的领导权力，决定在菏泽成立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以王化云同志为主任委员（据《冀鲁豫日报》1946年3月7日第二版报道：“在冀鲁豫区设立治河委员会……徐达本兼任该会主任委员”），并于沿河各专、县分别设立黄河修防处及修防段，作为治黄的专门机构，具体的组织与推动修堤整险工作。

2月27日，冀鲁豫行署又作出决定：在行署和一、二、四、五专署以及沿河各县立即成立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迅速清查河道历次决口的时间、地点、流经区域、受灾面积、修复时间、工程耗费、目前河滩土地面积、村庄、人口、林木数目、河道淤塞情况，堤内外地势高低及堤坝破坏情形，并收集群众对黄河归故的意见，做到有准备、有对策，以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防止河水突然到来。于是，沿河各县的党、政、军、民在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治理

黄河故道的紧张战斗。与此同时，沿河各人民团体、群众组织、进步人士，纷纷组织集会，发表谈话，游行示威，呼吁国民政府要顾全民命。

沿河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要求，得到了国民党黄委会和堵复局大部分人员的同情。1946年3月3日，黄委会委员长兼堵复局局长赵守钰亲赴河南新乡市，会晤了正在进行军事调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融洽的气氛中，共同商谈了有关黄河堵口复堤问题。

3月23日，边区政府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派遣参议会副议长晁哲甫，冀鲁豫行署副主任贾心斋、参议会副主任赵明甫三同志，赴开封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谈判黄河归故问题，从而揭开了黄河斗争的序幕。

三、国共同定开封协议

双方又聚菏泽古城

晋冀鲁豫边区代表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三同志，肩负着沿河人民的生命大患，恨不得即刻就达开封，与国民党共商一个妥善解决黄河堵口复堤的办法。不料，他们在途经安阳时，却遭到国民党四十军的无理留难。一个佩带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官衔，名叫李谊渲的人，明知三代表是专为解决黄河归故问题而来，却说什么“来的十分冒昧”，“共产党现在不合法”，并极力污蔑解放区军民。三代表极感气愤，给以正义的驳斥，使其理屈词穷无言可答。但是，他们还是处处设置障碍，不让赶赴开封。在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贾心斋同志对国军这种鄙卑的行径，进行了当众指责：“我们此行，是

受边区数百万人民的重托，担负着沿河数十万居民生死攸关的责任，谁阻碍了我们这种为人民的神圣意志，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其展开斗争！”接着又向其提出了严厉的书面质问和批评。到了第四日，赵守钰闻讯后，也感到分外生气，即刻派王恢先、孔令榕二人，用专车把三代表接到了开封。从此次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对黄河归故问题到底怀着什么样的用心。

三代表于1946年4月5日抵达开封，国民党黄委会、行总给予热情地迎接和招待。当日，赵守钰就主持召开了预备会议，商定谈判程序与谈判要点。次日，即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各有关代表相继发言后，中共代表就关于黄河的实况，人民八年来所遭受敌祸灾荒的痛苦生活惨状，及其听到黄河归故消息后的惊慌情况，做了真实的报告，与会各代表无不表示深切的同情。

4月7日，国共双方就“先治河后堵口”、“解放区派代表参加治河组织”、“救济河床居民”三个问题进行了继续会谈。第一个问题，国方认为，水的季节性很大，如不早日下手，秋水泛滥将无法堵口。因此，协议认为：堵口与浚河、复堤并进，但堵口到一定程度即行停工，等待治河工竣。浚河、复堤未及全部完成前，绝不能最后堵口。

第二个问题双方协议：直接主办堵口、复堤工程的施工机构，应本着统一合作原则，双方参加人员协商办理。解放区工段由国方黄委会与解放区治河委员会双方组成施工机构，共同负责办理浚河、复堤、救济等事宜。

第三个问题曾引起争论。中共代表提出“河床居民迁移应由国家每人赔田地三亩，房屋一间，以维持最低生活”一项

后，国方认为：“河床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不能给予赔偿。”此种说法，显系曲解是非，对人民疾苦不负责任的态度，没能获得多数代表的同意。经中共代表据实说明“国家从来也不可能购买过黄河河床土地”后，大家才一致认为：“河床内居民的迁移救济工作，自然是必要的。”第三个问题的协议是：一面由黄委会拟具预算，专案呈请政府核拨；一面由马（杰）署长、荷海宁分向行总、联总申请救济。

此次开封谈判，虽然不能满足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但是，总算获得了初步协议，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我们的部分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开封协议，了解河床居民状况及堤坝破坏情形，以决策浚河复堤的施工计划，国民党黄委会特组成黄河故道勘测团，在中共代表的陪同下，于4月8日由开封出发，沿黄河故道至海口，历时七天，途经17县，跋涉2,000余里，对黄河故道进行了较全面的勘察。一路上勘察团的团员们亲眼看到了千疮百孔的大堤，破坏惨重的大坝，故道内堆积的沙丘，林木掩映的村庄及河床内青青的庄稼苗；并亲耳听到了故道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先复堤，后堵口”的呼声。勘察团的人们均说：“黄河故道破坏情形超乎预料之外。”国民党黄委会委员长赵守钰说：“黄委会必须与解放区各方合作，中央（指国民党）也不应不顾民命。黄河治不好，是国家的耻辱。”他又说：“黄委会编造预算时，按事变前物价增加2,000倍，在郑州物价已增长6,000倍，可是中央只按增加800倍批准，真叫我管黄河的人做难。”他还说：“勘察团从开封出发时，有人劝告我‘给共产党联系麻烦会更多’，但事实是，解放区的群众有组织，政府能协助，工程一定能更快更易进行。”在利津县勘察时，该县参议长和副议长对赵守钰说：“本县老百姓都不愿叫黄河再回

来。”赵守钰在说明了黄河泛人民的悲惨生活后，表示意见说：“无论那里的老百姓都不应该被淹，黄河归故必须先修理河道和筑堤，保证不使这边的百姓受淹。”堵复局总工程师陶述曾向赶来请愿的群众表示说：“我是水利工程师，是叫黄河为人民造福的，不是叫黄河祸害人民的，不复堤，绝不堵口放水，如果蒋介石不听，我就辞职不干。”

黄河故道勘察团于4月15日返回菏泽。当日下午3时，我代表冀鲁豫行署设宴为勘察团洗尘。晚上7时在菏泽交际处又一次举行了黄河问题座谈会，参加人员有我和冀鲁豫行署的贾心斋、罗士高、赵明甫、成润、华夫等；国民党黄委会的赵守钰、陶述曾、左起彭、孔令榕、许瑞鳌等；渤海区的刘季青同志也参加了会谈。

在座谈会上，中共代表赵明甫同志首先根据开封会谈精神及勘察情形，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此次黄河归故系国民党政政府有所计划，与黄河自然泛滥改道不同，应力求一劳永逸。根据勘察情况，浚理河道较为修堤修坝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于浚河复堤工程完竣后，方能合龙放水。第二，经此次勘察后，更感救济工作之艰巨。故道内新建村庄很多，救济问题应再慎重考虑，必须保证每人维持其适当生活。第三，冀鲁两省之黄河故道90%在解放区，为施工方便及增强工作效能，治黄各级组织，均须解放区政府参加领导及一切工作。后经6时30分钟的分项讨论，获得协议，概述如下：

一、明确决定浚河、复堤、修坝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堤线问题，除修补旧大堤外，鲁省南北两岸部分地区先修旧临黄堤，裁湾取直部分，得测量后再行决定。

二、施工机构问题，仍以开封决议之统一合作精神，双方

配备人选，具体人数俟双方请示上级后再决定。

三、迁移救济问题，河道内村庄之迁移，已确定概算标准，由黄委会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拨发迁移费，救济则代请行总、联总负责办理。

四、为施工方便，急须恢复之交通，应根据施工情形逐步修堤，但不得作为军事运用。

其他具体问题尚待继续商谈，但不得由此而拖延所有测量施工工作之进行。

菏泽协议，是一个比较公正的协议。它的成立，使解放区人民，因黄河归故而惶惶不安、疑虑焦急的心情，才稍觉有点宽慰。然而，在菏泽协议刚刚签定后的两天，治河形势又突趋严重，群众情绪又再度焦急不安起来。

四、陶述曾重定堵口计划

南京城国共再成协议

1946年4月17日，菏泽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中央社却发出了“黄河堵口复堤决定两月内同时完成”的消息。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又在发出的一则消息中声称：“倘黄河汛前不克全部完成堵口工程，政府方面实不能负其全责。”接着，国民党所有的报纸在其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的煽动下，也都异口同声地撒起谎来了，说什么“中共方握有雄厚之人力物力，有完善的组织，足以为两个月内把复堤修坝浚河工程，配合花园口堵口工程同时完成”。

从以上事实，人们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的黄河归故企图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国民党在东北的内战正在继续扩大，

对中原野战军的围攻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在平汉、陇海、同蒲铁路线上，正紧张地进行着军事部署，长江沿岸苏皖地区军队的调动，也越来越加频繁，他们蓄谋已久的全面内战就要开始了，为此，国民党撕毁了菏泽、开封两协议的一切条款，加快步伐，抢时间堵口，阴谋以黄河归故分割解放区。

国民党政府两个月内完成堵口的决定，不但引起解放区全体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引起国民党黄委会、堵复局内部，以总工程师陶述曾为首的大多数技术人员的不满。陶述曾认为，在下游堤防未修，河床居民未迁，秸料、石料运至堵口工地甚少的情況下，要两个月内完成花园口堵口，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在赵守钰的支持同意下，就堵口计划问题，陶述曾与傲气十足的塔德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并果断地否定了塔德的堵口计划，停止了原计划的引河开挖工程，卸掉了打桩架，还准备放弃200米长的浅水占，留600米宽的口门浅水，以防河床刷深。陶述曾又根据对花园口口门的周密考查，制定了自己的堵口计划：

一、复堤工程和河槽裁湾取直工程本年11月底完成，加培堤工明年4月完成。

二、堵口工程大汛前仅做成西部浅水占800米，留下东部的深水工程到本年10月初复工，12月底完成，黄水于12月间回复故道。

三、利用已回故道的水道，运输沿河险工所需的石料，整理险工工程及修防备料明年6月底以前办完。

四、本年大汛前加强防泛新堤，开通涡河通泛水道，分泄洪水，减轻泛区灾情。

这是一个十分切实可行的施行计划，它既顾全了故道两岸

人民的利益，又减轻了泛区人民的灾难，所以，此施工计划上报后，得到了赵守钰和黄委会、堵复局的批准，解放区政府也表示同意。

1946年4月30日，国民党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带领一批水利专家，到花园口堵口工地视察工程，经过一番细致慎重的研究后，也批准了这一计划。可是，如此一个合情合理的施工计划，却遭到了塔德的坚决反对。当陶述曾刚一提出自己的施工计划，塔德就跑到上海，向联总中国分署告状，说什么“工程完成无问题（指两个月内堵口成功），只是黄委会（指国民党）不肯出力去做”。联总负责人根据塔德的报告，向行总提出威胁说：“如果黄河的工程不急进，就停止供应器材。”与此同时，塔德又从上海跑往南京，向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了同样的状。这样就引起了联总、国民党行政院、行总对其水委会、黄委会、堵复局批准陶述曾施工计划的做法极为不满。

1946年5月1日，就是薛笃弼亲自批准陶述曾施工计划的第二天，薛正在一个堵口工程技术会议上称赞着陶述曾的施工计划之际，突然，他接到宋子文一封关于“堵复工程应依原定计划积极进行，未可展缓”的电报。宋子文在电报中指出：“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前经决定于本年枯水时期修复，兹闻黄河水利委员会据鲁豫两省河工局报告，以下游工程未能赶筑已定堵口工程缓至秋后举办，此事关系重要，未宜遽定缓修，且国际视听所系，仍应积极兴修。已电飭交通部迅速修筑未完工之铁路，准备列车，赶运潞王坟之石方前至工地。希速飭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如有实际不能完成堵口时，届时可再延缓，此时未宜决定从缓也。”薛阅电后，当众推翻了自己前一天的决议和刚才的讲话内容，并宣布“本人的决议和讲话全不算

数，希诸位遵照宋院长的电报指示，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

陶述曾的施工计划被否决了。堵口工程虽然依照塔德的原定计划在进行着，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技术人员的情绪都大大低落下来，对宋子文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电报指示，产生了疑问。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也纷纷以“视察”“参观”的名义，赶到花园口工地，为加快堵口工程督促打气。1946年5月5日，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在“视察”堵口工程时，亲口对薛笃弼、陶述曾讲“黄河归故，可抵十万大军”，有意指使黄委会、堵复局堵口放水，显系包藏着军事企图。

国民党政府这种不顾下游人民死活，决定两个月内完成堵口的片面意见，引起了解放区人民的坚决反对。他们到处呼吁，推选代表，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请愿。1946年5月3日，《冀鲁豫日报》发表社论，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忠实实践菏泽协议”。同日，冀鲁豫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和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冀鲁豫办事处，向全国各党派、团体、学校、报馆及全国同胞发出通电，吁请国民党政府“花园口堵口工程应立即暂行停止”，“对河床新旧村庄居民即刻发出救济”，“对河南新泛区同胞大力进行救济”。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将军也在这一日，特致函薛笃弼、赵守钰。函中说：

“黄河之为祸为福，端赖河床之坚固与否，今即从早治理，深望以巩固安全为主旨，不应以军事交通之便利为急务……党派的政事是暂时的，人民的生存是永久的，究竟对人民负责，还是对少数党派负责？果真不浚河复堤而先堵口合龙，则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吾兄岂能脱卸责任？”

5月8日,《冀鲁豫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政府“最近津浦、陇海、平汉各线,国民党军运频繁,正在计划向豫北、津浦进行之大规模军事部署。蒋介石亲飞郑州、西安视察,白崇禧亲赴徐州、新乡巡视,并亲往花园口‘视察’黄河堵口工程,不难判断,国民党当局正在策划着一个巨大的军事阴谋,这个军事阴谋不是和堵口放水没有联系的,他们策划随黄水而来的是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我们不能麻痹自己,阴谋毒辣流氓成性的国民党当局,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的。”社论要求解放区人民“不要对国民党存丝毫幻想,他们不会有什么仁慈怜悯,他们说话不当话,协议定了可以不执行,他们不会听从人民的意见,除非人民起来用力量把他们的阴谋打得粉碎的时候,才能逼他不得不向人民让步”。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认为,国民党政府“借治河为名,蓄意淹毙冀鲁豫三省同胞,而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分不开的。中共对于千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决不能坐视不顾”。并声明“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不顾民命,首当其冲的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为了生存,将被迫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其后果应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5月13日,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副主任贾心斋,为民请命,致电全国,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堵口工程。电文称:“经开封磋商及黄委会勘察团之勘察,而有4月15日明确之决议,先浚河复堤后堵口之菏泽协议,此与目前国民党积极准备重挑内战有密切关系,两月堵口实是国民党向我冀鲁豫军事进攻之一部,如此种反动阴谋一旦实现,则全边区1200万人民将重罹内战与洪水之严重灾难。”电文恳求:“各民主政党、法团及各界政界人士为冀鲁豫边区1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共同采